



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

VICTORIAN IMAGES OF CHINA

黄时鉴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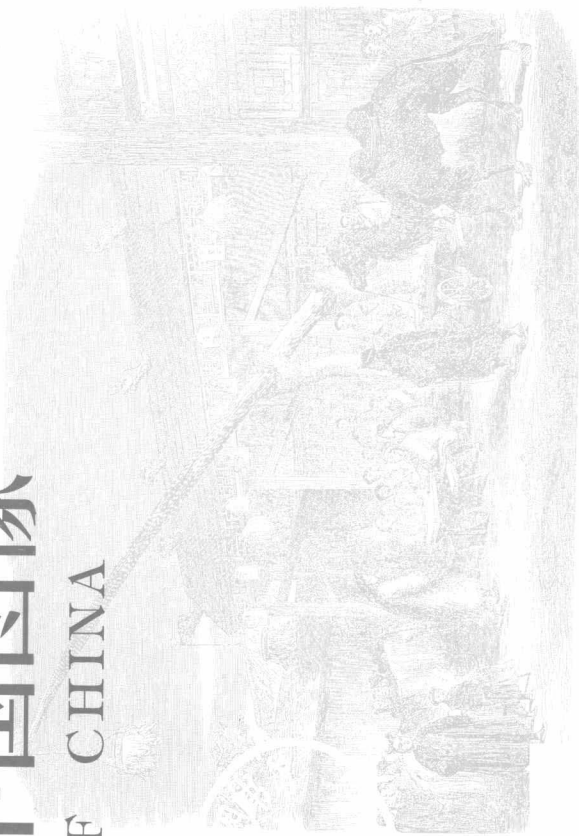


上海辞书出版社

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

VICTORIAN IMAGES OF CHINA

黄时鉴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 / 黄时鉴编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326-2546-8

I.维… II.黄… III.中国—古代史—史料—1842~1894 IV.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0137号

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

编 著 黄时鉴

责任编辑 柴 敏
装帧设计 林 北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辞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 话 021—62472088
网 址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印 刷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1/16
印 张 27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6-2546-8/K · 552
定 价 1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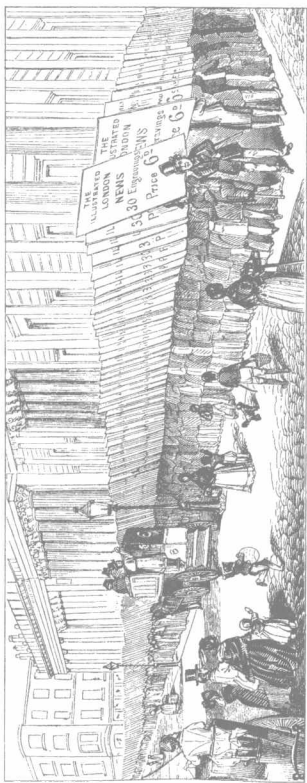
我们所采用的这份刊物的英文名称是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中文如何翻译颇费斟酌。今可见的中文译名有《伦敦画报》、《绘图伦敦新闻》、《伦敦新闻画报》、《伦敦图画新闻》和《伦敦时事画报》等。若单从我们所利用的这前几十年刊物的实际状况看，似也可译作“伦敦插图新闻”，因为那时文字仍占较大篇幅，尽管它意在图文并茂，图文交融，但如考虑到这个刊物的历史全貌，它后来已被公认为世界著名的以图像为主的画报，而且它在历史上还直接影响到中国画报的产生和发展，那么“画报”正可作为 *Illustrated News* 的中文译名，所以笔者以为将它译作《伦敦画报》较为适宜。

下面分四部分来介绍和论述《伦敦画报》和它所刊载的中国图像。

一、《伦敦画报》，其图像及其价值

《伦敦画报》是英国出版的一种杂志，于1842年5月14日创刊，迄今已持续一百六十余年。它在创刊后的一百二十多年内是一种周刊，每周六出版，8开纸面，开始时每期16页，后逐渐增为18页、24页、30页、40页，有时还加页或出增刊。从1971年5月起改为月刊，改刊的那期是80页，比此前40页的篇幅增加一倍。

该刊创办人是英格拉姆(Herbert Ingram, 1811—1860)。他从1833年起在诺丁汉从事印刷和书刊经销工作，在那里他已察觉凡报刊附有木刻版画插图的销量就好。1842年初春，他从诺丁汉来到伦敦，策划创办一种图文并茂而又价格不贵的杂志，适逢英国政府决定低价期刊免税，《伦敦画报》遂应运而生。创刊号共16页，载有32幅插图，使刊物的



Two hundred men with placards paraded through the London streets on the Friday before the paper started publication. The first number sold 26,000 copies.

《伦敦画报》创刊号发行之日
二百人在伦敦街上持牌做广告

面貌焕然一新，加上发行时别出心裁的创意广告，一下子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创刊号即发行 26,000 份，数月后每期发行量达到 65,000 份，这种销量是前所未有的。以后销量不断上升，到 1863 年时，每周达到 300,000 份，而当时日报中居于首位的《泰晤士报》的销量也只有 70,000 份。

在《伦敦画报》出刊以前，英国的报刊都是以文字为主，间或稍加插图，或在封面上刊登较大的图像。《伦敦画报》以一种崭新的图文并茂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它的创刊词期许，要“在世界面前持续呈现其一切活动的生动真相”。创刊以后，立刻获得巨大的成功。在它合订本第 1 卷的前言中，编者自豪地写道：“在它诞生之年，无可否认，《伦敦画报》已是最著名的最成功的新鲜事物。……它以一种崭新的赏心悦目的面貌出现，广为传播，博得称誉，迅即深入人心，唤起诚挚友情。”同时满怀信心地宣称：“我们知道，画报在这个国家问世，必定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到来，给文学以丰赡，给历史以库藏，有如那些石头的路标铺在时间的旅途上。”后来它的创办人始终标榜：“这世界展示的生活有多少，《伦敦画报》上就能看到多少。”¹

从创刊之日起的半个多世纪内，《伦敦画报》上刊载的图像是西方当时已趋成熟的密线木刻版画 (wood engraving)，它的原作是画家所绘的单色素描或水彩画。密线木刻版画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随着贝维克 (Thomas Bewick, 1753—1828) 的创作成功而开始发展起来，它不同于原先在较软的木材的弧面木纹上制作木版画 (woodcut)，而是改用硬木的端面木纹材料。雕刻硬木需要用更锋利的刀具，贝维克始用冰凿 (burin)，以后刀具不断得到改进和丰富。细纹利刃使密线木刻版画有了精细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在维多利亚时代，密线木刻版画处于鼎盛时期，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制作者，书籍和报刊上的插图大量采用此类作品。为了在《伦敦画报》上刊载上乘之作，英格拉姆找到当时一流的人才进行合作。画报上的大幅作品，需要选取纹路适宜的板块拼接后再进行绘制，它们都是画家和雕版家共同创作出来的。精画细刻，费工耗时，一幅这样的版画总要在事件已发生几个星期以后才可能刊印出来，采用英国海外的画作原件还要加上运送的时间。进入 1850 年代后期，也偶而刊载平版石印的彩色图画 (见本册环衬及页 149)。从 1880 年代末起，曾尝试刊印加有网线的照片，这时离照相术的发明已有四十余年，但仍因其图像不够清晰而未能推广。在有了照相术以后，该刊迨至 1894 年仍主要采用密线木刻版画的形式刊出图像，这显然是由于当时成熟的密线木刻版画技术已可以真实完美地表现各种图像，而照片制版印刷技术则尚未发展完善所致。

大致从 1895 年起，在《伦敦画报》上，照片的刊印明显增多；同时，可以表现绘画的晕染明暗技法的石印画已起



《伦敦画报》创办人英格拉姆肖像

¹ 在《《伦敦画报》125周年纪念专刊》(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25 anniversary Issue, 1842—1967, May 13, 1967) 上，AS MUCH LIFE AS THE WORLD CAN SHOW 是专文“《伦敦画报》史”的正标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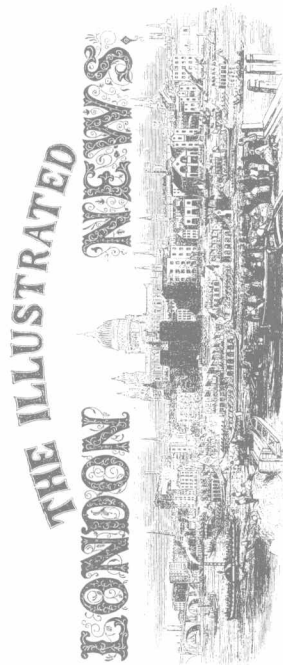
而取代密线木刻板画。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插图已以照片为主,而绘画作品除了速写,一度也广泛采用晕染明暗的技法,这当是受到照片效果的影响,并似有意与方兴未艾的摄影作品一争高低。这时候,木刻密线版画已基本上退出版面。照片刊印技术的进步及其使用的便捷,使它们终于成为书籍报刊上图像的主体,除了特殊的专门的书刊如画册、漫画、卡通和连环画等。《伦敦画报》也不例外。

19世纪英国图像刊印的演变有如上所述。但笔者在翻阅过去的《伦敦画报》时,却有一种直感:相比之下,还是密线木刻板画看起来更为清晰,更具有艺术性。这可能是笔者的偏爱,不过它们作为19世纪中后期西方密线木刻板画艺术高峰时期在报刊领域的主要展示作品,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无论是哪种题材,无论是何种事物,无论客体的大小或静动状态,密线木刻板画都能用其娴熟的技法表现出来。尤其要强调的是,当时这类作品完全是写实主义的,以描绘的真实性置于首位,因而总的说来,其画面基本上是实相的记录。顺便说一句,有人在初读这些作品时,还以为它们是我们中国读者比较先知的西方铜版画,又有人说它们是“制成锌版发表的”,¹这是一种误解。不过,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密线木刻板画的表现力和成熟程度。

在新闻史、报刊史上,除了图文并茂,《伦敦画报》还另有不少创意,包括首页上端以圣保罗大教堂为中心的刊头设计,将广告移至刊末三页,对英国和国际重大事件的详细连续报道,力邀顶尖作家或专家开辟新的专栏(如国际象棋局谱、桥牌案谱和音乐增刊等),还有许多那个时代涌现的科技成果、工业产品、劳工运动、时装款式、娱乐演艺以及通讯交通工具的发展(电报、电话、自行车、轮船、火车、电车、汽车……),等等。各阶层人士几乎都喜欢读它,甚至维多利亚女王每周也在等待新出一期的到来。

随着时光的流逝,《伦敦画报》的历史文献价值也日益显现,这一点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它为资料来源而汇编出版的的一些专题画册的不断问世。

进入20世纪后,《伦敦画报》社自身率先推出一些专题汇编。如《乔治国王五世与王后加冕图录》(*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Coronation Record Number, King George V. and Queen Mary*)、《记荣耀的维多利亚女王王时代(1837—1901)》(*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Record of the Glorious Reign of Queen Victoria, 1837—1901*)、《爱德华七世的生活和继位以



《伦敦画报》自创刊号起长期使用
的以圣保罗大教堂为中心的
刊头

¹ 哲夫主编:《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后记。

及亚历山大王后的生活》(*The Life and Accession of King Edward VII and the Life of Queen Alexandra*)、《记德兰士瓦战争, 1899—1900: 与布尔共和国伟大战斗的国家和殖民地武力的档案》(*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Record of the Transvaal War, 1899—1900: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Home and Colonial Forces in the Great Conflict with the Boer Republics*)。看来起初主要以英国王、后的活动为主题, 但也涉及其他, 如在殖民地进行的战争。

时间长了, 各方面累积的资料就日益丰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专题汇编的内容就广泛得多, 编者也不仅是《伦敦画报》社自身。诸如: 《〈伦敦画报〉给政治家、史学家、冒险家、战士和演说家丘吉尔的十八年献礼》(*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An Eightieth Year Tribute to Winston Churchill, Statesman, Historian, Sportsman, Soldier and Orator*), 1954; 《木刻版画精粹, 选自〈伦敦画报〉: 历史, 诗歌, 音乐, 艺术》(*Gems of Wood Engraving, Selections from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History, Poetry, Music, Fine Arts*), 1856; 《全景图像, 1842—1865, 见于〈伦敦画报〉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世界》(*Panorama 1842—1865, the World of the Early Victorians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967; 《作为热点新闻的历史, 1865—1897, 见于〈伦敦画报〉和〈图画〉的十九世纪后期的世界》(*History as Hot News, 1865—1897;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orld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and The Graphic*), 1974; 《〈伦敦画报〉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史》(*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1975; 《伟大的考古学家: 自1842年迄今〈伦敦画报〉最初报道的古代文明的当代世界发现》(*The Great Archaeologists: the Modern Worlds Discovery of Ancient Civilisations as Originally Reported in the Pages of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from 1842 to the Present Day*), 1976; 《〈伦敦画报〉伊丽莎白十一世女王银婚纪念, 1952—1977》(*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Silver Jubilee of Queen Elizabeth II 1952—1977*), 1977; 《〈伦敦画报〉伦敦乡村篇章》(*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Book of London 's Villages*), 1980; 《〈伦敦画报〉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史》(*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Social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1982; 《穿过〈伦敦画报〉的十九世纪铁路史》(*Nineteenth-Century Railway History Through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984; 《〈伦敦画报〉二十世纪的伟大事件》(*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Great Events of the 20th Century*), 1989; 《〈伦敦画报〉: 走向战争, 1933—1939》(*Illustrated London News: Marching to War 1933—1939*), 1989; 《画面汇编: 〈伦敦画报〉描绘的国家》(*Dynamics of the Pictured Page: Representing the Nation i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998; 《〈伦敦画报〉: 伊丽莎白女王陛下下一个世纪的生活, 1900—2002》(*Illustrated*

London News :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the Queen Mother —the Life that Spanned a Century 1900—2002), 2002; 《日本与〈伦敦画报〉: 所报道事件的完整记录, 1853—1899》(*Japan and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 Complete Record of Reported Events, 1853—1899*), 2006, 等等。至于在众多的论著中从各种专业视角来征引其所载图像及文字的情况更是十分广泛, 难以计数。

从上面举述的目录看, 这些专题画册的主题多半是以英国为主体的, 也有涉及世界大事的。不论主题如何, 每部画册的内容都十分丰富、生动和翔实。兹举一例, 1967年出版的《全景图像, 1842—1865〈伦敦画报〉上所见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世界》。全书为大16开(22×30厘米), 虽仅159页, 但所收内容包括: 形成中的历史、英国和世界的新闻热点、维多利亚女王被刺、在巴黎的革命、澳洲移民、克里米亚战争、奴隶制度、美国内战、诸多发明、早期铁路、泰晤士河底下的第一条隧道、大西洋底下的第一条电缆、布鲁内尔的第一艘金属船、社会环境状况、艺术、犯罪、赛马、政治、社会、科学、时尚、自然现象、怪异。布莱恩特爵士(Sir Arthur Bryant)更在其前言中指出: “通观《伦敦画报》的合订本诸卷可知, 对于任何时代或国家的社会历史, 它们大概是最重要的单幅图像资料的来源。我能够想到, 没有任何来源可以提供如此众多的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历史和我们自己革命世纪的画面。她是一宗鲜活的时代画卷, 一周复一周地加以描绘, 展现英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 而且借以联系在一起。”¹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从1842年到1894年, 我们收集到的关于中国的单幅图像多达四百几十幅, 这是一宗不容忽视的资料。

二、《伦敦画报》上的中国图像

在《伦敦画报》出刊以前, 英国的杂志只是少量刊登一些插图, 其中有关中国的图像可谓屈指可数。如1832年3月31日创刊的《佩妮杂志》(*Penny Magazine*)和同年7月7日创刊的《星期六杂志》(*The Saturday Magazine*)就是这样, 它们当时已很有名。以封面整幅的图像为例, 《佩妮杂志》1835年一期(编号214)的封面是北京城楼, 1840年一期(编号509)的封面是鸦片走私。《星期六杂志》刊登中国图像稍多一些, 1832—1838年间出现在封面上的就有中国长城(1832)、中国刑罚(1835)、中国礼仪习俗(1835)、精神的中国纤夫(1837)、广州河景(1837)、中国农民(1837)、

¹ *Panorama 1842—1865, the World of the Early Victorians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London, 1967, Foreword by Arthur Bryant.



“精神的 中国 纤夫”，英国《星期六杂志》（1837年3月4日）封面上的插图，取自亚历山大《中国服装》一书中的“一群纤夫”

广州市郊景象（1837）和中国戏场（1838）等；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1843年曾连续五期在封面分别刊登中国五个通商港口的插图。此外，1841年创刊的《潘奇》（Punch）是漫画杂志，起初还很少登载中国图像。

《伦敦画报》问世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作为一种新闻周刊，《伦敦画报》对于当时在英国和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有突出的报道，在中英关系方面也是如此。它既然总体上注重图像的刊登，在报道中国时自也不会例外。它创刊后不久适逢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字，所以一开始就注意报道中国。随着中英关系的发展，它对中国的报道和所截图像也日渐增多。作为世界上第一份经营成功的画报，它刊出的中国图像当时无疑是最为丰富的。

《伦敦画报》很早就意识到，对于重大事件做好重点报道是杂志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关键。在报道重大事件的时候，它往往会派出专门的画家兼记者（或兼通讯员）。这些特派画家除了用画笔记录新闻的画面，也顺手画下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图像，《伦敦画报》均注意采用。这些图像不断呈现在英国和西方读者面前，使他们渐渐了解和认知中国。当然这些图文从英国的立场看待这些事件，有其报道的视角和重点，在今天我们中国读者看来，有的显然会不以为然，有的会引起反感以致愤慨。但这也是历史事件的一个侧面，从中我们仍可以更深刻地认历史的本相，它的沉重，它的冲击力，它对后人的启迪。

当然，总的说来，有关中国报道的文字和图像，只是占了《伦敦画报》的很小一部分。《伦敦画报》登载的新闻，分英国国内和海外两大块。当时英国是所谓“日不落帝国”，其殖民势力伸张到世界各个角落，因而中国毕竟只是它关注和报道的一个方面。而从刊物的性质来说，它要着重报道的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及其相关的人物和背景之类，因此，有关中国的图文，在该刊的出现又是十分不平衡的。一般说来，在半年一大册的合订本上，只能见到若干幅图像，有时候连一幅也没有。只是当发生中国国内和中外关系的重大事件时，相关新闻才陡然增多，插图也随之大量出现，诸如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

我们将《伦敦画报》所刊登的中国图像进行整理，觉得大致上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重大事件直接有关的内容，另一部分是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描绘。

第一部分的内容，基本上集中在一个时段，当时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今天视作具有历史意义的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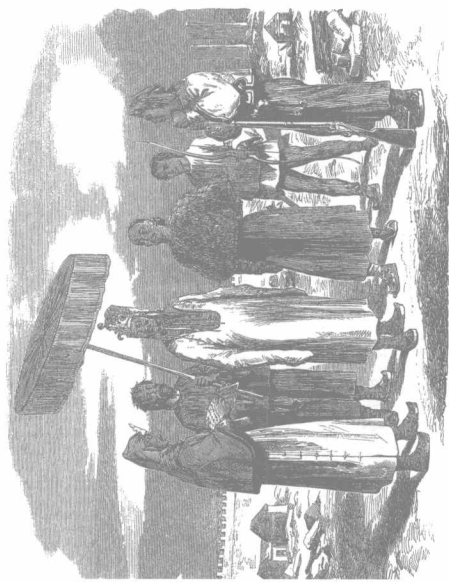
资料，可以对相关文字资料做出诠释和补充，它们具有明显的历史文献价值。这里略举几例。

如由于太平天国的宗教观念，其治下的艺术作品不准出现人物造型，因此相关图像仅见于少量外国的出版物。国

人比较熟悉的首推呤喇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的插图，其中有天王洪秀全像、忠王像、作战图和军事会议图等。¹《伦敦画报》在1853年11月5日、1855年2月24日、1857年3月14日、1857年3月21日和1864年3月12日诸期上均载有太平天国人物图，上至官将，下及士兵，人像颇多（见本册页246）。这些图像当是据威廉斯（Williams）所作素描制成密线木刻板画刊登。它们后来不时被一些出版物引用，但往往未注明出处。其中如“太平官员和士兵的服装”（Costumes of Taiping officers and soldiers），邓之诚等编《太平天国资料》曾予收入，标题作“太平天国将官兵士像”，并说明“此像采自《东洋历史大辞典》第5卷505面”，其实就是从《伦敦画报》掇拾而来，却未注明。这幅画，近人也有采编刊印，可惜还是未注出处。²

又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伦敦画报》连续刊登了许多图片，今已收入本册，毋需一一举述。沃格曼（Charles Wirgman）是此刊当时派往中国的特派画家兼通讯员。笔者曾读到《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一文，³主要凭借沃格曼的图像和文字报道，描述了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的情景，尤其是对圆明园的毁坏及其劫掠行径。作者据沃格曼的一幅画面（见本册页227），考述了圆明园被毁以前的那座位于清漪园山上的佛香阁。此文是一个实例，说明《伦敦画报》上的中国图像以及文字，具有特殊的价值。笔者相信，从本册呈现的图像出发，通过深入的研究，当可做出更多类似的作品。

这里还可以一提的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获得了难以计数的“战利品”，《伦敦画报》后来对此也略有披露。1861年4月6日一期上刊登了“中国炮”，一组六幅（见本册页221）。这些炮的素描是由英国海军军医邦克（George Bank）所提供，并有文字说明。文称：“中国的炮发射后难以冷却，而且容易自爆。他们曾力图改进，有的增大加重，有的用纵线加箍制造，有的用同心环制造，有的逐段嵌接而成，其他的或采用彼此精密烧嵌的上佳管材，但均不成功。[英国]阿姆斯特朗和威特伍斯的炮，几乎不会爆裂，加有膛线，一切工艺力求完善。这些改进近几年内都已做到。而令人吃惊的是，当我走过大沽要塞，我见到许多被弃置的中国炮显然很旧，它们就按照上述方法制造，



“太平官员和士兵的服装”，威廉姆斯绘

¹ 呤喇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卷首载有五幅黑白人像和五幅彩色图画。

² 如可见于哲夫主编《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页86，题为“太平天国将士在南京”。

³ 周健森、沈衍琪：《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载京报网www.bjd.com.cn，2007-04-24 07:30，《新华文摘》（2007年第13期）全文转载。

而并不采用约在17世纪末南怀仁已曾传授过的用铜或铁铸造炮的方法。对于现在制炮膛和膛线的方法，他们更是一无所知。这些炮都显得怪异，所以我做了速写，连同一些数据寄去。”就双方武器装备的对比而言，从军事史的角度，这当是一篇宜加重视的对方记录。

1861年4月13日一期上还刊登一幅“法国获自中国的战利品，近展出于杜伊勒利宫”（见本册页224）。相应的文字说明是：英法联军在中国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的真正价值很可能难以估计。在圆明园攻取后散失的大量珍宝，按照市场价格，一说要达到二百万英镑。其中多数已由“蛮夷”的军队带走，并依个人战胜者的愿望任意处置。一定的数量已被中国人在上海、香港和其他地方购买；其他部分已由我们的军队带往印度；而大量珍奇物品已转移到各战胜国的首都，在那里它们可能落入卑俗之手。但是就一部分而言，它们从天朝咸丰的宫殿处所移到拿破仑第三的皇宫，则仅仅是住址有所改变，而其贵重品质并无损伤，因为这三件宝物作为礼物由法国远征军带回法国呈送法国皇帝，得到小心周到的护送而抵达杜伊勒利宫（Tuileries）。图上的主要人像是展示身穿战时冠服的皇帝。其上是皇冠，皇冠之右为宫廷所藏的青铜铸钟（图上是一对中的一个），帝服左右是一批选出的武器，其中有十支火器，每支的形制各不相同。图上的塔是最有兴味的藏品之一，高约七英尺，造型优美适度，塔柱的周围有十三行汉字铭文。与塔相对的是一座大香炉，方约30英寸。此炉铜质，珞琅色彩完美，其制作奥秘在欧洲尚不为人知。塔和香炉之间有两件玉如意。下端右方是怪兽，在展览品中有两个，每个重600英镑；左方是马具和马饰，也是皇家用品。看着这幅图画，读着这些文字，令人触目惊心，愤慨不已。在战争中实施的这种对文明的摧毁和掠夺，无论如何是一个罪恶的行为。将他国之宝物掠到自家的宫中，那“仅仅是住址有所改变”吗？常将本民族文化引以为豪的法兰西人，在这里应该怎样来表示对中华文化的歉疚和尊重呢？

再如中日甲午战争的图片，《伦敦画报》也有大量刊载。从本册编入的一些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当时激战的场面和气息。多数是当时的特派画家和记者伍德维尔（R. Caton Woodville）的作品。为了丰富报道的内容，除了伍德维尔，《伦敦画报》还刊登其他目击者的作品，他们是英国的军事或外交人员。此外，关于黄海战役，甚至采用了中日双方的图像资料。譬如在1894年10月6日这一期上，“中国军队运输船‘高陞’号为日本巡洋舰‘浪速’丸击沉”一图是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所载图片由英国人布朗（Arthur B. Brown）加以补绘；同时刊出“牙山大胜”、“海战捷音”、“倭兵无状”和“形同海盜”四幅中国画作（见本册页380、381），今可考知均出自《点石斋画报》！当时英国并不是

！《点石斋画报》的四大主题之一是“中外纪闻”，目的在于增加刊物的“历史感”。在甲午战争时，该刊登载不少激越的场面，旨在鼓舞人心，谴责倭人。但近人指出：“应该说，‘中外纪闻’篇最能显示郑振铎所说的，‘画史’特色，晚清众多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都在此留下长长的身影。可也正是这一部分，暴露了《点石斋画报》长于‘报喜’而拙于‘报忧’的老毛病。”（陈平原、夏晓虹编注：《晚清图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页22—23）笔者以为该刊有关甲午战争的画作，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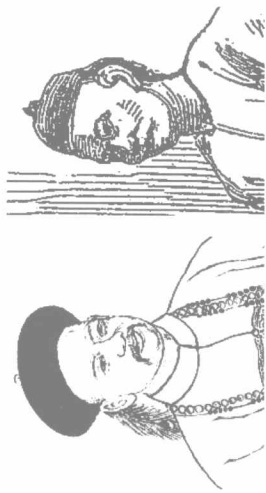
直接的交战国，英国政府在中日交战时基本上持中立态度，《伦敦画报》也是如此。

第二部分非常繁杂和零碎，诸如人像、服饰、生产、生活、街市、行当、风俗、礼仪、风景、建筑、刑罚、宗教……等等，穿插在互不关联的各期页面上。这些作品的原稿多半也出自特派画家之手，他们在完成主题报道的同时，顺手画出。各人观感不同，作品自然多样。但就单幅作品所描绘的内容而言，它们却有一个共性：通过点点滴滴、形形色色的不断呈现，构成一个丰富的复杂的多方面的中国形象。当然这个中国形象并不是完整的、清晰的；但它们本身的历史真实性，它们在中西方中国图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却同样不容忽视和值得深入研究。笔者试初探几例。

1851年是《伦敦画报》取得显著成功的一年，这年它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大展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和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就这一年的中国来说，中英之间并无大事。但这年的《伦敦画报》上还是有两幅值得注意的中国图像。

所谓“大展览会”，实际上就是第一届世界博览会，1851年在伦敦举行。在上海申请举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时候，有关方面从中国文献确认并得到英文文献印证，1851年的首届伦敦世界博览会，虽然清政府没有正式参加，但有中国商人徐荣村以“荣记湖丝”前去参展，并获得英国女王颁发的金银大章。¹现在我们在《伦敦画报》的1851年8月30日这一期上，可以看到一幅“女王陛下在奥斯邦宫接

见中国家族”的画面（见本册封面及页51），相应的文字报道是：“英国女王在上周一给予中国士绅琼阿德（Chung A-tai）先生一家以殊荣，在奥斯邦宫会见他及其两位小脚妻子和姻嫂。他们新近从中国抵达英国。这是任何中国家族得以享此优遇的首例，为了支持他们敢于克服中国人不让任何女子离国的根植于心的偏见而竟然离别其天朝上国。2月20日，一行在香港搭乘英船‘女子庇勒’（Lady Peel）号启程，途经苏门答腊、圣海伦娜岛，随后于本月10日到达格瑞符森德（Gravesend）安全登陆。他们来此国的目的之一是参观大博览会，上周六他们已经如愿以偿。”接见时，女王及其眷属还接受了徐氏家族的礼物，聆听了琼阿德年轻夫人的演唱；琼阿德太太将亲自精绣制作的一双女鞋赠送给公主。笔者认为，这幅图像所展示的正是女王接见徐荣村的场景。根据是：一、当时并无其他新近从香港抵达英国的中国家族，而徐荣村作为参展的唯一的中国商人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有其一定的理由；二、徐氏名瑞珩，字德琼，号荣村。英文记述中称他为“Chung A-tai”，不无可能，这个Chung是“琼”的音译，而tai则是“德”的音译，A-tai即“阿德”或“亚德”。²三、比对画上的Chung A-tai和《北岭徐氏宗谱》上的“德琼公遗像”，颇为相似，此决非出于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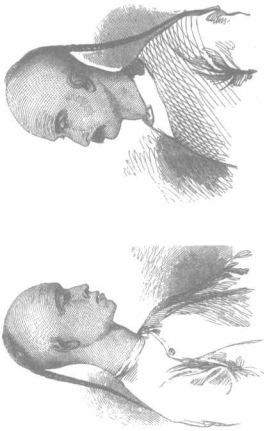


徐荣村像的比较图，左图是《北岭徐氏宗谱》上的“德琼公遗像”，右图是《伦敦画报》所载“女王陛下在奥斯邦宫接见中国家族”插图上的Chung A-tai（琼阿德）像

¹ 相关史事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页49—55。

² 当时英人所使用的各种汉语罗马字拼音系统，普遍地以t表示浊辅音，以t'表示清辅音，即t相当于今汉语拼音的d，t'相当于今汉语拼音的t。

另一例是，1851年12月13日这一期上载有两幅中国河南开封地区犹太人赵万贵(Chaou Wan-kwei)和赵京经(Chaou Kin-ching)的肖像。(见本册页52)长期以来，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和现状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话题。这是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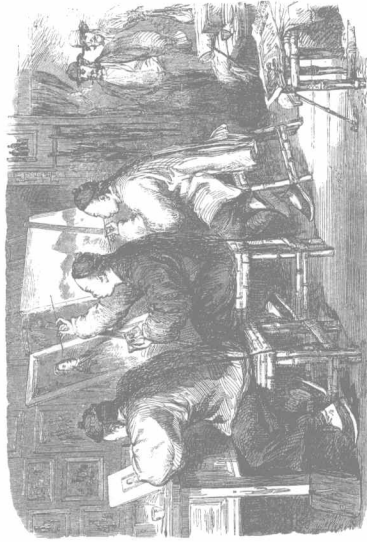
开封犹太人赵万贵和赵京经头像

幅最早真实绘制的犹太人肖像，并连带记载一段重要的往事。在西方人不断考察和提示开封犹太人的情况以后，1850年11月，两个由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出的中国人邱天生(Ch'iu T'ien-sheng)和蒋荣基(Chiang Jung-chi)前去开封进行访问调查，购得希伯来文方经散经卷8册，并写有报告和日记。他们后又去开封购得希伯来文大经6卷(原总共有13卷)，还带了这两位犹太人到达上海。这两人后住在麦都思(W. H. Medhurst)处，学习希伯来文。那时最后一位拉比(rabbi，犹太学者、掌教人)过世已约五十年，开封犹太人中已无人通晓希伯来文。当时赵万贵年已四十，是开封犹太人之长，握有当地犹太教寺的钥匙，他学过中文，还是其教派孩童的教师。其兄赵京经四十三岁，粗通文墨！这两幅肖像无疑是十分珍贵的。

此外，再举述两例。1859年4月30日的一期上载有一幅“中国画家”(见本册页185)。相应文字称：此画出自一幅本刊特约艺术家的素描(当即沃格曼)，

画室的内部，那里有三兄弟艺术家在工银板照相作细密画，构图美观。第二位正油画，他执笔之法不同于欧洲人，并将其而其左手执着正在握以放大的银板照相。

像，就如同我们所做的那样。第三位正在景。这些画家充斥于香港，几乎可以满足些本地画家极其聪明，其中少数人已经以欧洲的透视法，因而能制作非常好的油画和则是从照相复制细密画，他们受教于欧洲人，而做得臻于完美。他们的一些色彩已为人知晓，在欧洲得到赞美，其中尤其以朱砂为甚，尽管最华丽的蓝色广为使用。这幅画真实描绘了中国外销画绘制的场景。我们只要稍微注意过有关中国外销画的论著，就会发现此画是被西方和中国的研究者不断引用过的，但却往往不标注出处。至于上述相关的文字说明，引者都略而不提，其实那是研究中国外销画的很好的第一手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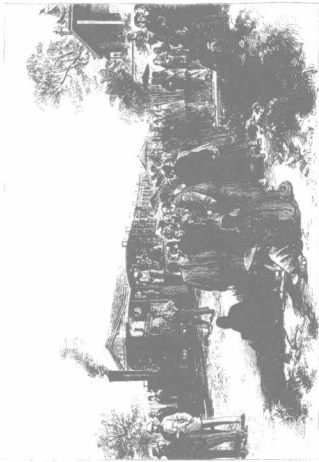


“中国画家”，沃格曼绘

描绘在香港的一个中国作。第一位正在据一幅在将同一作品复制为手搁在一片木板上，中国人用方格放大图为商人首领画香港一任何绘画的需求。一中国人的精细来运用水彩画。而他们的长处

1 相关史事，出版于上海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在1851年报道过两次(1月18日，第25期；8月16日，第55期)。蒋、邱日记的内容辑入史密斯和麦都思所著《开封犹太教寺调查记》(George Smith And W. H. Medhurst: A Narrative of a Mission of Inquiry to the Jewish Synagogue of Kaifang Fu, on Behalf of the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 Shanghai, 1851)。参见 W. C. White, Chinese Jews: A Compilation of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Jews of K. aifeng Fu, Toronto, Canada, 1942; 参见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页84—85；荣振华、李渡南等编著，耿昇译:《中国的犹太人》，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页305—309。

又，1873年2月22日一期上载有三幅北京天坛的图像：北京天坛奉献牺牲的祭坛、北京天坛北祭坛和天坛（见本册页275—277）。天坛图像很多，谁人都有印象，这三幅的不同之处是画面上都有清代官吏在举行典礼时动态。尤其是第一幅描绘了在祭坛奉献牺牲的情景，第三幅天坛进行祭天礼仪时的大场面，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实像纪录。



《伦敦画报》上的“中国首条铁路开通：第一列火车从上海出发”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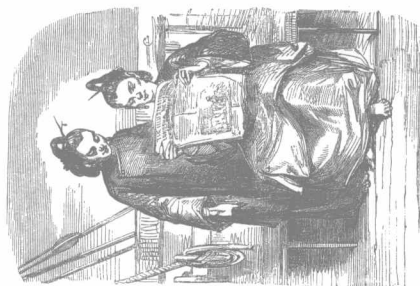


载于英国《图像》杂志上的“中国上海首列火车始行”图

又，1876年10月2日一期上载有当年6月30日上海吴淞铁路首次通车的图像，连同一篇比较详细的文字报道，记录了在中国铁路上最早的首次运行（见本册页310）。文称：“我们希望此事标志着引入欧洲进步的科学和机械的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¹ 无独有偶，英国的《图像》（*The Graphic*）对此事也有报道，也登载了一幅图像，相应的文字报道中评说：“在中国那样一个如此保守和在其文化方面许多世代如此稳定的国家，铁路的开通在天朝帝国的编年史上形成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如果铁路在这个国家一旦迈开坚实的一步，就有希望其他的改变接踵而至，可能像中国的表兄弟海岛日本热衷于采用西方的礼仪和习俗那样。”²

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不再赘述。笔者相信，在这第二部分画作中，读者除了可以知道当时西方人透过《伦敦画报》曾经看到过哪些中国社会生活的图像，还可以引起自身对旧时中国社会图像的记忆，其中有的读者还可能从不同的专业视角看出一些作品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甚至进而做出一些新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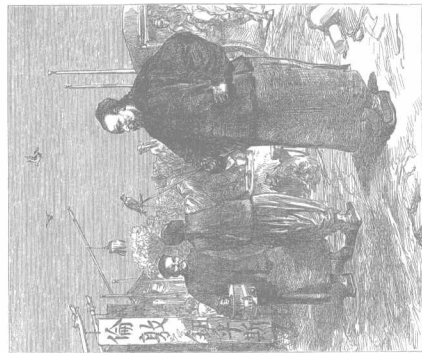
此外，连带说一下，在编辑这本画册的过程中，编者觉得《伦敦画报》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关于它在中国的流传，从本册所编入的图像中就可得到若干信息。在1858年2月27日一期上，有幅题为“中国妇女在阅读”的作品（见本册页132），画面的背景似在船上，阅读的是《伦敦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这是一个证据，说明此时《伦敦画报》已传入中国。在同年3月20日一期上，还有一幅“广州军训”（见本册页141），相关的文字解说表明，这是英军占领广州后组织男子进行“军训”为他们服役。作画的特派画家说明：“如果他们见到自己（指



“中国妇女在阅读”，沃格曼绘

¹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Sept. 2, 1876, p. 222.

² *Graphic*, Dec. 23, 1876, p. 624.



“中国素描：北京街景”，辛普森绘

受训的中国男丁)被刊印出来,他们就会喜出望外,因为中国人十分爱好用《伦敦画报》来糊他们的墙壁和帆船。”这又是一个证据。可见在1842年五口通商以后,中国与西方来往日益增多,到了这个时候,英国出版的流行刊物《伦敦画报》已经进入中国。至少该画报在中国的特派画家和通讯员持有自己的刊物当在情理之中;实际上其他入华的英国人也会将它带进来的。这两幅画的作者应当就是下文要提到的沃格曼。

隔了十几年,另一位特派画家辛普森(下文将论述)也在中国亲眼目睹《伦敦画报》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销售和张贴情景。在《伦敦画报》1873年9月13日这一期上,载有一幅他画的“中国素描:北京街景”(见本册页295),街上一铺面前挂出“伦敦钮乎斯”的大字,显示当时北京街头已有英文《伦敦画报》出售。“伦敦钮乎斯”当即*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中文音译,省略了*Illustrated*。¹当时西方有的画家将本人绘入画面,辛普森有时也是如此,从长像一看便知,街上那个手中执鸟的人正是他本人。又,在1873年11月22日这一期的第476页上,还登载了一幅题为“上海一舢板”的画作(见本册页298),描绘的是他在观赏舢板舱内贴满的《伦敦画报》和《潘奇》(*PUNCH*)²上的画面。他在相关的文字报道中说,船家对此举颇为得意,这点可以同上述沃格曼的说法相呼应。辛普森认为,上海舢板上之所见,有如当时在英国的公共马车和铁路车厢内张贴《伦敦画报》和《潘奇》的画页一样,是为它们自身做的广告。如此说来,《伦敦画报》那时已在中国有一定程度的流行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伦敦画报》在中国报刊史上的影响,可以推测也是比较大的。从中国近代画报的若干中英文对照的名称看,画报正是*Illustrated News*的对应词,它是在《伦敦画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被中国报人逐渐采用的一个新词,后来终于约定俗成,沿用至今。编者不是专门从事中国报刊史研究的,但相信有关专家必能详言确论。

三、《伦敦画报》特派中国的画家

派遣本刊的画家和记者进行实地报道是《伦敦画报》长期坚持的传统做法,同时它也注意使用其他目击者或本地人的作品。当重大事件发生时,《伦敦画报》会特派画家到中国来从事报道。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派了沃格曼,甲午战争时派了小伍德维尔。他们到中国后身历其境绘出大量素描和水彩画寄回英国,并附有书信、通讯和评论;或者其绘画用作他人文字的插图。他们相当于今天的战地摄影记者,但遇到中国国内的重大事件,自然

¹ 当时另有将*NEWS*译作“纽斯”的。郭嵩焘《使西纪程》附《上海至伦敦日记》:“潜明言英国日报凡四;曰《代渡斯》[*Times*, 泰晤士报],曰《得令纽斯》[*Daily News* 每日新闻],曰《斯丹得》[*Standard*, 旗帜报],曰《得勒格纳福》[*Telegraph*, 电讯报]。”(江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63)《使西纪程》撰于1877—1878年。

² “*Punch*”,意为英国木偶戏,其主角为“*Punch*”和“*Judy*”。*Punch*是英国首屈一指的讽刺杂志,它创刊于1841年7月17日,比《伦敦画报》还早一年。维多利亚时代所刊文章常由当时前列漫画家提供插图,制成木板画刊印。它关注英皇政治和国际事务,但有关中国的插图,比《伦敦画报》要少得多,而且限于漫画作品。它已在2002年停刊。